

回顾与省思：梁启超和湖南时务学堂^{*1}

庄泽晞

(中山大学历史学系, 广东广州 510275)

【摘要】：梁启超对时务学堂评价颇高，而言及后来的教育界，则多表忧思。从清末时期之新式学堂，到民国年间的大学建设，梁氏皆曾亲任其事，出于切身体会的思考，也因而更具价值。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教习，乃因其新学造诣与变法立场，契合于湖南士绅讲求实学、开通风气的诉求；梁氏则将在湘事业，视为贯彻康派方针的良机。时务学堂育才良多，得力于维新时代的学风所成，梁氏等人对“立志”诸义的强调，也切中当下教育的某些偏弊。

【关键词】：时务学堂；梁启超；湖南新政；变法运动

【中图分类号】：K256.5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：A **【文章编号】**：1008—1763(2017)06—0013—05

梁启超任教清华国学院时期，在与诸生的一次谈话中，曾抚今追昔地说起当年之事：“大约三十多年前，我二十余岁，在长沙，与几位同志办了个时务学堂。学生先后两班，每班各四十人。办了一年多，遇着戊戌政变，学堂解散了……”梁对这段过往深有感触，认为当时虽“功课简陋得可笑”，学生人数亦少，但皆极有求学热情，故能造就颇为为国效力的人材。梁氏的谈话，除流露对蔡锷等昔日弟子的缅怀，告诫清华学生勿忘己责，其余则多言及对当时教育界的反思，如谓“反观现在的学校，多变成整套的机械作用：上课下课，闹得头昏眼花；进学校的人，大多数除了以得毕业文凭为目的以外，更无所谓意志，也没有机会做旁的事情，有志的青年们，虽然不流于这种现象，也无从跳出圈套外”，更不满于求学之人充斥着“物质的、功利的观念”。^[1]

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教习，是在1897年底；^[2]受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，则是1925年之事。时务学堂为清末湖南新政的重要举措，清华学校则是中国崇高学府之一。在梁氏后来的回顾中，更把前者视作理想的典范，对后者所代表的现代教育，却不无遗憾，对其教学多表质疑，指出：“试问学生终日忙于机械的训练中，哪有深造自得的机会？”担忧学风因之变得“急功近利”，而学者尤“以断片的智识相夸耀”。从清末时期之新式学堂，到民国年间的大学建设，梁氏皆曾亲任其事，基于其切身体会，深觉改造教育之任重道远。鉴此背景，回顾其与时务学堂的相关机缘，对于梁氏后来的反省与忧思，或可有更为深切的了解。

一 赴湘缘起

湖南时务学堂之创立，始于当地士绅的倡导，初由王先谦领衔呈请，并得巡抚陈宝箴批准，于1896年底开始具体的筹备。决定聘请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，则是官绅合议的结果。蒋德钧赴外考察相关人选后，推荐了《时务报》的译员李维格与主笔梁启超，并谓：“时报西文李主笔，中文梁卓如孝廉主笔，天下通儒也。我西教习聘李，中教习遂聘梁何如？虽程度过高，局面稍阔，必能开风气，造人才，有益于湘。”^[3]其意见随即获得首肯，学政江标提到：“此间时务学堂拟敦请卓公为主讲，官绅士民同出一心，湘士尤盼之甚切也。”^[4]时任按察使的黄遵宪，也“力言总教无足俞于梁卓如者”。^[5]在诸人的促成下，梁氏遂于1897年底离开时务报馆，由上海启程赴湘。^[6]

¹ 收稿日期：2017-09-15

作者简介：庄泽晞(1989—)，男，广东潮州人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，研究方向：中国近代史。

以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，本身便是维新立场的表明。若就旧学造诣而论，湘中本多宿儒，而对梁氏之学问，质疑者也不无其人。杨度在戊戌年的日记中，便记录了与梁的论难，写道：“过璧垣，问省中知名者，曰梁卓如，康长素弟子也，主讲时务学堂。正欲闻康氏之学，乃往访之。与论《春秋》，能知圣人之非宋儒，其学盖私受于廖平而不曰王门者，欲为立名地耳。学堂章程，学生各受《孟子》，继读《春秋》，以合公法。余谓公法之不合《春秋》者多矣，即以《春秋》正之，是非虽明，不能行于万国，第欲明其是非，则不合《春秋》，岂独公法一书哉。以此为学，是欲张其门面以骗馆地耳……论辩甚多，词气壮厉，卓如初犹肆辩，后乃遁词。然而其人年少才美，乃以《春秋》骗钱，可惜！可惜！”^[7]其时杨度从学王闿运，称引师说，于他人所论多不以为然，故当听闻南学会设坛开讲，杨亦认为：“讲学而无湘绮，知其儿戏矣。”^[8]

湖南方面决意聘梁，则更多看重其讲新学、倡变法之长。先前梁氏主笔《时务报》，发表《变法通议》，奠定了在新派之地位，所撰《西学书目表》、《读西学书法》，更是当时士子考求西学的指南，如顾燮光所言：“清光绪中叶，海内明达惩于甲午之衅，发愤图强，竞言新学，而译籍始渐萌芽。新会梁氏著西学书目表及读西书法，学者方有门径。”^[9]湘地官绅对《时务报》印象甚佳，陈宝箴、王先谦皆曾谕令购买，发放书院以广阅读，^[10]梁启超备受器重，即颇得益于，初抵湘时“宾客盈门，款待优渥”。^[11]陈宝箴奏请设立时务学堂时，折中亦谓：“近年闻见渐拓，风气日开，颇以讲求实学为当务之急……当于本年秋冬之间，与绅士筹商，在省会设立时务学堂，讲授经史、掌故、公法、方言、格致、测算等实学。额设学生一百二十人，分次考选，而延聘学兼中西、品端识卓之举人梁启超、候选州判李维格，为中学西学总教习。另设分教习四人。”^[12]陈氏正以“风气日开”勉励湘人，并以“学兼中西”表彰梁氏。

梁启超初窥西学，乃受其师康有为之影响。1890年梁在上海购读《瀛寰志略》，“始知有五大洲各国，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，心好之，以无力不能购也”。^[13]次年从学康氏，在万木草堂三年间，“于国学书籍而外，更购江南制造局所译之书，及各星轺日记，与英人傅兰雅所辑之《格致汇编》等书”，凡不明之处，“皆就有为决疑滞”。^[14]1895年康在北京倡立强学会，梁任书记员，居会所数月中，“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，得之余日尽浏览之”，^[15]其西学根基即由此而来。梁启超的新学造詣，也致用于时务学堂的教学中，所颁“读书分月课程表”，胪列各西学要籍，令学生勤加研习，以为“经世”之用——“时务学堂学约”有言：“居今日而言经世，与唐宋以来之言经世者又稍异，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意，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，以为之经，以求治天下之理；必博览历朝掌故沿革得失，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，以为之纬，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；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，知其积弱之由，及其可以图强之道，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，及各国报章，以为之用，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。夫然后可以言经世。”^[16]康、梁此前对于新学的留心，正为此理念提供了坚实的依托。

二 洵为国事

梁启超于1897年11月14日抵达长沙，次年三月即因病返沪，再未回到时务学堂，在湘讲学时间，前后不过四月。^[17]惟在梁氏的后来忆述中，时务学堂的经历却不断被提起，究其原因，除对昔日弟子“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”的痛惜与哀悼，更多的可能，则是时务学堂寄托了其颇多夙愿与志望。将此在湘事业，置于梁氏当时奔走国事的情境之中，或能更好地理解这点，如梁在《三十自述》中提到的：“（戊戌年）春，大病几死，出就医上海，既痊，乃入京师。南海先生方开保国会，余多所赞画奔走。四月以徐侍郎致靖之荐，总理衙门再荐，被召见，命办大学堂译书局事务。时朝廷锐意变法，百度更新，南海先生深受主知，言听谏从。复生、漱谷、叔峤、裴村以京卿参预新政，余亦从诸君子之后，黽勉尽瘁。八月政变，六君子为国流血。南海以英人仗义出险，余遂乘日本大岛兵舰而东。”^[18]在纷繁多端的救国事业中，时务学堂亦为康梁一派的重要举措。

康梁走上历史舞台，乃以“公车上书”为标志，在国事危殆之下，同人认识到“广求同志，开倡风气”的重要，梁氏即称：“我辈今日无一事可为，只有广联人才，创开风气，此事尚可半主。”^[19]康有为在建言君上变法的同时，也积极组织学会、发行报刊，以宣扬其救时主张，惟其收效不孚人望，不仅上书格不上达，强学会也在短暂繁盛之后，走向封禁、停办的结局。维新事业既艰阻颇多，赴湘开拓新地，便成为可备抉择的方案。梁氏对于湖南之事早有留心，曾谓：“十八省中，湖南人气最可用，惟其守旧之坚，亦过他省，若能幡然变之，则天下立变矣。”^[20]得知陈宝箴、江标等开明人士主事湖南，梁更主动表达了赴湘意愿，向汪康年谈到：“时局之变，千幻万诡，哀何可言！黄门以言事伏诛，学士以党人受锢，一切情节，想铁樵、伯唐书中详

之，无事琐缕。南北两局，一坏于小人，一坏于君子，举未数月，已成前尘，此自中国气运，复何言哉……湘省居天下之中，士气最盛，陈右帅适在其地，或者天犹未绝中国乎？若报馆不成，弟拟就之。”^[21]梁启超赴湘之事确定后，康有为随即参与相关谋划，友人忆称：“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，亦在沪商教育之方针。”^[22]

康氏在致友人的书信中，亦和盘托出其构想，谓：“当戊戌以前，激于国势之陵夷。当时那拉揽政，圣人无权，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，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，度大势必戢戢割鬻至尽而后止，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。用是奔走南北，大开强学、圣学、保国之会，欲开议院、得民权以救之。因陈右铭之有志，故令卓如入湘。当时复生见我于上海，相与议大局，而令复生弃官返湘。以湘人材武尚气，为中国第一，图此机会，若各国割地相迫，湘中可图自主。以地在中腹，无外人之干涉，而南连百粤，即有海疆，此固因胶、旅大变而生者。诚虑中国割尽，尚留湘南一片，以为黄种之苗，此固当时惕心痛极，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。卓如与复生入湘，大倡民权，陈、黄、徐诸公听之，故南学会、《湘报》大行。湘中志士，于是靡然发奋，人人种此根于心中，如弟所云是也。”^[23]依其所述，则梁启超赴湘乃出于康的派遣，意在助使湖南自立，以为救亡之基。此说后也得到梁氏的印证，梁自述道，其时“瓜分之忧，震动全国，而湖南始创南学会，将以为地方自治之基础，余颇有所赞画”；^[24]另又言及：“当时更有一个发狂的举动，就是想运动湖南独立。”^[25]

康派主办的《知新报》，也对湘局甚为关注，曾载报道称：“近湖南巡抚陈右铭中丞与江建霞学使，实力提倡，风气大开，顷创一大学堂，讲求中西政治之学。每年常款，已集有二万余金，规模可以大开。现已分门聘请名师，并广购仪器图籍，闻下半年可开办。三十年来，各学堂之规模，未有善于此者。”^[26]梁启超前往湖南途中，即致函陈三立与熊希龄，提出自聘分教习的要求，^[27]并与同门的韩文举、叶觉迈、欧榘甲携同赴湘，共入事于时务学堂。此举之意，无疑是为康派争取契机。如同梁氏后来的回顾：“自时务学堂、南学会既开后，湖南民智骤开，士气大昌，各州县府私立学校纷纷并起，小学会尤盛。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，以爱国相砥砺，以救亡为己任，其英俊沉毅之才，遍地皆是。……自是以往，虽守旧者日事遏抑，然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湖南智士之志，不可夺矣。虽全国瓜分，而湖南亡后之图，亦已有端绪矣。”^[28]梁在时务学堂所致力者，不仅为助湖南一地之新政，更在于其国事方略的贯彻落实。

三 学风所成

时务学堂既由康派弟子参予其中，学风自也深受其师门影响。识者既已指出，时务学堂“所有一切的学纲、学课、学风，都是脱胎于长兴学舍而来，稍微加以变化罢了”。^[29]“长兴学舍”即万木草堂，康有为于1891年“开堂于长兴里”，“与诸子日夕讲业，大发求仁之义，而讲中外之故、救中国之法”。^[30]其时康氏正赴京师力促变法，返粤后则“尽出其所学，教授弟子，以孔学、佛学、宋明学为体，以史学、西学为用，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，发扬精神，广求智慧”^[31]。其维新立场与忧国之志皆感染着同人。在梁启超看来，万木草堂诸生“皆天真烂漫，而志气蹀躞向上，相爱若昆弟，而先生视之犹子”，康氏上课“每讲辄历二三个小时，讲者忘倦，听者亦忘倦。每听一度，则各各欢喜踊跃，自以为有所创获，退省则醺醺然有味，历久而弥永也”，故有“学于万木，盖无日不乐”之语。^[32]学生热忱求知，团结精进，正得益于康有为所营造的氛围。

日本人田野橘次曾慕名造访万木草堂，述其所感，谓：“身入其中，荒落若野人家，而堂中子弟，讲学孜孜，夜以继日。”在与康门诸生交流之后，又写下笔调生动的印象记，称：“万木草堂之教育，专重于精神教育，以养成国民完全之资格，实不啻日本吉田松阴之松下村塾、西乡南洲之鹿儿岛义塾也。有为时在北京，上书光绪帝曰：帝宜效俄国彼得大帝，及日本维新皇帝之志愿与决断，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，庶可挽回国势，不然则中国必为外强所分割。上倾其言，遂悉弃旧臣而咨政治于彼。彼于时寄信于草堂之公众，报北京之事曰：革新之事在即，诸生勉哉！诸生得此信，同声呼曰：吾辈不出，如苍生何！其中慷慨之士，或中宵悲歌，或蹴褥舞剑，或论天下之经纶，或计中邦之利害，或泣或笑，要其归，则咸为忧国忧民而已。可爱哉此风，可敬者此风！”^[33]康氏引导诸生以国事为怀，又善勉励士气，劝读日本志士吉田松阴之著，“凡入塾者皆授以《幽室文稿》，曰：苟士气稍偶衰落，辄读此书，胜于暮鼓晨钟也”。^[34]颇以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事，作国人立志救亡的表率。

这些经历，无不对梁启超产生深刻影响，后其主事时务学堂，对此传统亦多发扬，“于精神教育，三致意焉”。^[35]梁氏起

草《时务学堂学约》，即首标“立志”之义，强调“惟志不立，天下无可为之事”，谓：“今二三子俨然服儒者之服，诵先王之言。当思国何以蹙，种何以弱，教何以微，谁之咎与？四万万人，莫或自任，是以及此，我徒责人之不任，我则盍任之矣。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，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，孔子之志也；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妇，不被其泽，若己推而纳之沟中，伊尹之志也；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，孟子之志也；做秀才时，便以天下为己任，范文正之志也；天下兴亡，匹夫之贱，与有责焉，顾亭林之志也。学者苟无此志，虽束身寡过，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，虽读书万卷，只成碎义逃难之华士。”^[36]在其教导下，学堂诸生如李炳寰、林圭等，皆强调学者之志，当在“起衰振蔽，上利于国，下泽于民”，“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”。^[37]时务学堂育才良多，首批学生仅四十人，“而五分之二都成了革命先烈，或开国名人”，^[38]即得力于此学风。

1922年梁启超再度莅湘，重游故地，在面向教育界人士的演讲中，便有过一番慨叹，称：“回想我在湖南时的时务学堂，以形式与知识而论，远不如现在的学校。但师弟同学间精神结合联成一气，可以养成领袖人才，却比现在的学校强多了。现在的学校，表面虽好，却如做买卖的杂货店，教职工是卖货者，学生是买货者，师弟间不发生关系。造就一班水平线的人才即可，要想造就特别人才，是难能的。希望以后的湖南教育界注意现在时势的需要，采取新式的完备的办法，不要丢却了从前的精神。”^[39]所言与《北海谈话记》辉映成趣，同为梁氏痛切之感。梁以毕生尽瘁国事，见证过大历史之变迁，维新志士的使命与抱负，及对国家之情感、担当，皆甚令其缅怀，视作变法时代的宝贵遗产，也沉淀为对晚辈的训诫与期望。“不要丢却了从前的精神”一语，既是梁氏对于曾经志业的致意，也是对后世教育的忠告。而时至今日，回顾其与时务学堂的此段因缘，其中深意，当更在对时代精神的召唤，与对当下偏弊的躬自反省。